

**坚持社会主义办报路綫
肅清資產階級办报思想**

复旦大学新聞系

1957年9月30日

目 錄

(一)

文汇报的资产階級方向应当批判	(1)
文汇报在一个時間內的资产階級方向	(5)
录以备考	(7)
严肃認真地学习人民日报的两篇文件	(8)
办报要有立場	(13)
坚决地同资产階級办报傾向作斗争	(13)
站稳立場根除錯誤	(15)
坚持工人階級的新聞路綫	(17)
从文汇报的錯誤中吸取教訓	(19)
克服资产階級办报傾向	(23)
坚决保卫无产阶级办报路綫办好青年报刊	(26)
上海新聞界应当深入开展办报路綫問題的辯論	(30)
坚持社会主义的办报路綫	(36)
坚守社会主义新聞事业的陣地	(42)
对新聞工作者的一个教訓	(48)

(二)

人民需要怎么样的报纸 (王謨)	(51)
怎样办一張社会主义的报纸 (王芸生等)	(55)
粉碎右派分子篡夺新聞事业阴谋在党的领导下办好社 会主义报纸 (楊永直等)	(60)
必須解决办报的路綫問題 (王芸生)	(68)

(三)

彻底清算我的资产阶级新聞观点学做一个坚强的共产

主义新聞工作者(張黎羣).....	(71)
檢查我的資產階級的办報路綫(赵超构).....	(77)
我的檢討(戈揚).....	(90)
我的反党罪行(徐錫成).....	(96)

(四)

整风以来本报几个錯誤宣傳的初步檢查(中国青年报).....(114)

本报在章伯鈞、儲安平篡改政治方向期間所犯錯誤的

檢查(光明日报).....(118)

整风以来本报一些主要錯誤的檢查(北京日报).....(141)

关于本报几个錯誤报道的檢查(大公报).....(145)

向人民請罪.....(150)

痛切改造自己.....(154)

我們的初步檢查(文汇报).....(156)

从“草木篇”錯誤报道吸取教訓.....(172)

从“北大民主牆”报道中得到的沉痛教訓.....(175)

从五月份本报新聞标题的錯誤檢查我們的資產階級新

聞观点(新民报).....(178)

我們的錯誤(新观察).....(181)

“时事手册”是怎样被篡改政治方向的(“时事手册”

李蓬茵).....(185)

我們的自我批評(文艺报張光年等).....(193)

(一)

人民日报七月一日社論

文汇报的資產階級方向应当批判

自本报編輯部六月十四日发表“文汇报在一个時間內的資產階級方向”以来，文汇报、光明日报对于這個問題均有所檢討。

光明日报工作人員开了几次會議，严肃地批判了社长章伯鈞、总編輯儲安平的方向錯誤，这种批判态度明朗，立場根本轉过来了，由章伯鈞、儲安平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資產階級路綫轉到了革命的社会主义的路綫。由此恢复了讀者的信任，象一張社会主义的報紙了。略嫌不足的是編排技巧方面。編排的技巧性和編排的政治性是两回事，就光明日报說来，前者不足，后者有余。技巧性問題是完全可以改的。在編排技巧方面改一改，面目一新，讀者是会高兴的。这件事也难，本报有志于此久矣，略有进展，尚未尽如人意。

文汇报写了檢討文章，方向似乎改了，又写了許多反映正面路綫的新聞和文章，这些当然是好的。但是还覺不足。好象唱戏一样，有些演員演反派人物很象，演正派人物老是不大象，装腔作势，不大自然。这也很难。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綫問題上沒有調和的余地。編輯和記者中有許多人原在旧軌道上生活慣了的，一下子改变，不大容易。大势所趋，不改也得改，是勉強的，不愉快的。說是輕松愉快，這句話具有人們常有的礼貌性質，这是人之常情，应予原諒。严重的是文汇报編輯部，这个編輯部是該报關資產階級方向期間挂帅印的，包袱沉重，不易解脫。帅上有帅，攻之者說有，辯之者說无；并且指名道姓，說是章罗同盟中的罗隆基。两帅之間还有一帅，就是文

汇报驻京办事处负责人浦熙修，是一位能干的女将。人们说：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就是文汇报的这样一个民盟右派系统。

民盟在百家争鸣过程和整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恶劣，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都是自外于人民的，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还有农工民主党，一模一样。这两个党在这次惊涛骇浪中特别突出。风浪就是章罗同盟造起来的。别的党派也在造，有些人也很恶劣。但人数较少，系统性不明显。就民盟、农工的成员说来，不是全体，也不是多数。呼风唤风，推涛作浪，或策划于密室，或点火于基层，上下串连，八方呼应，以天下大乱、取而代之、逐步实行，终成大业为时局估计和最终目的者，到底只有较少人数，就是所谓资产阶级右派人物。一些人清醒，多数被蒙蔽，少数是右翼骨干。因为他们是右翼骨干，人数虽少，神通却是相当大的。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

新闻记者协会开了两次会，一次否定，一次否定之否定，时间不过一个多月，反映了中国时局变化之速。会是开得好的，第一次黑云压城欲摧，摆出了反动的资产阶级新闻路线。近日开的第二次会，空气变了，右派仍然顽抗，多数人算是有了正确方向。

文汇报在六月十四日作了自我批评，承认自己犯了一些错误。作自我批评是好的，我们表示欢迎。但是我们认为文汇报的批评是不够的。这个不够，带着根本性质。就是说文汇报根本上没有作自我批评。相反，它在十四日社论中替自己的错误作了辩护。“我们片面地错误地理解了鸣放政策，以为只要无条件地鼓励鸣放，就是帮助党进行整风；多登正面的意见，或者对错误的意见进行反批评，就会影响鸣放”。是这样的吗？不是的。文汇报在

春季里执行民盟中央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方针，向无产阶级举行了猖狂的进攻，和共产党的方针背道而驰。其方针是整垮共产党，造成天下大乱，以便取而代之，真是“帮助整风”吗？假的，真正是一场欺骗。在一个期间内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见，对错误意见不作反批评，是错了吗？本报及一切党报，在五月八日至六月七日这个期间，执行了中共中央的指示，正是这样做的。其目的是让魑魅魍魉，牛鬼蛇神“大鸣大放”，让毒草大长特长，使人民看见，大吃一惊，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些东西，以便动手歼灭这些丑类。就是说，共产党看出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这一场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让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发动这一场战争，报纸在一个期间内，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见，对资产阶级反动右派的猖狂进攻不予回击，一切整风的机关学校的党组织，对于这种猖狂进攻在一个时期内也一概不予回击，使群众看得清清楚楚，什么人的批评是善意的，什么人的所谓批评是恶意的，从而聚集力量，等待时机成熟，实行反击。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因为事先告诉了敌人：牛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它们，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便于锄掉。农民不是每年要锄几次草吗？草锄过来还可做肥料。阶级敌人是一定要寻找机会表现他们自己的。他们对于亡国、共产是不甘心的。不管共产党怎样事先警告，把根本战略方针公开告诉自己的敌人，敌人还要进攻的。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就是说，不可避免的。人的意志想要避免，也不可能。只能因势利导，夺取胜利，反动的阶级敌人为什么自投罗网呢？他们是反动的社会集团，利令智昏，把无产阶级的绝对优势，看成了绝对劣势。到处点火可以煽动工农，学生的大字报便于接管学校，大鸣大放，一触即发，天下顷刻大乱，共产党马上完蛋，这就是六月六日章伯钧向北京六教授所作目前形势的估计。这不是

利令智昏嗎？“利”者，夺取权力也。他們的報紙不少，其中一个叫文汇报。文汇报是按照上述反动方針行事的，它在六月十四日却向人民进行欺騙，好象它是从善意出发的。文汇报說：“而所以发生这些錯誤認識，是因为我們头脑中还殘存着的資產階級办报思想”。錯了，应改为“充滿着”。替反动派做了几个月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的喉舌，報紙的方向改成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方向，即資產階級的方向，殘存着一点資產階級思想，夠用嗎？这里是一种什么邏輯呢？个别性的前提得到了一个普遍性的結論，这就是文汇报的邏輯。文汇报至今不准各批判自己大量报导过的違反事实的反动新聞，大量刊发的反动言論，大量采用过的当作向无产阶级进攻的工具的反动編排。新民报不同，它已經作了許多比較認真的自我批判。新民报犯的錯誤比文汇报小，它一发现自己犯了錯誤，就認真更正，表示了這張報紙的負責人和記者們对于人民事业的責任心，这个報紙在讀者面前就开始有了主动。文汇报的責任心跑到那里去了呢？你們几时开始，照新民报那样做呢？欠債是要还的，文汇报何时开始还这笔債呢？看来新民报的自我批判給文汇报提出了一大堆难题，讀者要問文汇报那一天赶上新民报呢？文汇报現在处在一个完全被动的地位。在新民报沒有作自我批判以前，文汇报似乎还可以混过一些日子，有了新民报的自我批判，文汇报的日子就难过了。被动是可以轉化为主动的，那就是以新民报为师，認真地照它那样办。

現在又回到“資產階級右派”这个名称。資產階級右派就是前面說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資產階級反动派，这是科学的合乎实际情况的說明。这是一小撮人，民主党派、知識分子、資本家、青年学生里都有，共产党、青年团里面也有，在这次大风浪中表現出来了。他們人数极少，在民主党派中，特別在某几个民主党派中却有力量，不可輕視。这种人不但有言論，而且有行动，

他們是有罪的，“言者無罪”對他們不適用。他們不但是言者，而且是行者。是不是要辦罪呢？現在看來，可以不必。因為人民的國家很鞏固，他們中許多又是一些頭面人物。可以寬大為懷，不予辦罪。一般稱呼，“右派分子”也就可以了，不必稱為反動派。只在一種情況下除外，就是累戒不改，繼續進行破壞活動，觸犯刑律，那就要辦罪。懲前毖後，治病救人，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這些原則，對他們還是適用。另有一種右派，有言論，無行動。言論同上述那種右派相仿，但無破壞性行動。對這種人，那就更要寬大些了。錯誤的言論一定要批判干淨，這是不能留情的，但應允許他們保留自己的意見。所有上述各種人，仍然允許有言論自由。一個偉大的鞏固的國家，保存這樣一小批人，在廣大羣眾了解了他們的錯誤以後，不會有什麼害處。要知道，右派是從反面教導我們的人。在這點上，毒草有功勞。毒草的功勞就是它們有毒，並且散發出來害過人民。

共產黨繼續整風，各民主黨派也已開始整風。在猖狂進攻的右派被人民打退以後，整風就可以順利進行了。

人民日報編輯部六月十四日評論

文匯報在一個時間內的 資產階級方向

下面轉載的這篇文章見于六月十日文匯報，題為“錄以備考”。上海文匯報和北京光明日報在過去一個時間內，登了大量的好報道和好文章。但是，這兩個報紙的基本政治方向，卻在一個短時期內，變成了資產階級報紙的方向。這兩個報紙在一個時間內利用“百家爭鳴”這個口號和共產黨的整風運動，發表了大量表

現資產階級觀點而并不準備批判的文章和帶煽動性的報導，這是有報可查的。這兩個報紙的一部分人對於報紙的觀點犯了一個大錯誤。他們混淆資本主義國家的報紙和社會主義國家的報紙的原則區別。在這一點上，其他有些報紙的一些編輯和記者也有這種情形，一些大學的一些新聞系教師也有這種情形，不只文匯、光明兩報如此，不過這兩報特別顯得突出罷了。錯誤觀點是可以經過研究、考慮和批判加以改變的，我們對他們期待着。從最近幾天這兩個報紙的情況看來，方針似乎已有所改變。黨外報紙當然不應當辦得和黨報一模一樣，應有它們自己的特色。但是，它們的基本方向，應當是和其它報紙一致的。這是因為在社會主義國家，報紙是社會主義經濟即在公有制基礎上的計劃經濟通過新聞手段的反映，和資本主義國家報紙是無政府狀態的和集團競爭的經濟通過新聞手段的反映不相同。在世界上存在着階級區分的時期，報紙又總是階級鬥爭的工具。我們希望在這個問題上展開辯論，以求大家在這個問題上取得一致的認識。新聞記者中，有一部分共產黨員和青年團員也有資產階級新聞觀點，也應當考慮、研究、批評這個錯誤觀點。教條主義的新聞觀點和八股文風，也是應當批判的。這一方面的東西是很討厭的。黨報，包括本報在內，在這一方面犯有錯誤。這一方面的錯誤，在辯論中也必須展開批判。這樣一來，在新聞問題上就要作反“左”反右的兩條戰綫上的鬥爭。姚文元的文章只是含蓄地指出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看到了文匯報的一些人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上向無產階級進行階級鬥爭的這個明顯的和有害的傾向，是一篇好文章，故轉載于此。並且借這個由頭，向我們的同業——文匯報和光明日報說出我們的觀點，以供考慮。

錄 以 備 考

——讀報偶感

姚 文 元

同是一條消息，經過不同的編輯同志的編排，其價值竟可以相差十萬八千里之遙，這個奇妙的秘訣，是我最近從報紙上得來的。

前幾天毛主席在接見共青團代表時發表了講話。講話雖短，含意卻極深長。解放日報用特別巨大的鉛字和醒目的標題放在第一條新聞，人民日報排在當中，標題比解放日報要小些，也突出了“團結起來，堅決地勇敢地為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而奮鬥，一切離開社會主義的言論行動都是錯誤的。”但文匯報呢，卻縮小到簡直使粗枝大葉的人找不到的地步，或者看了也覺得這是一條無足輕重的新聞。其全部地位，大約只有解放日報標題用的鉛字二個鉛字那麼大。

到底是什麼緣故使三個報紙編輯部對一條新聞的估價相差如此之遠呢？是因為解放日報認為這條消息特別重要呢，還是因為文匯報編者同志覺得這個談話是談談什麼社會主義、黨的領導……之類早已“聽得爛熟”的老話，沒有什麼新鮮內容，所以無足輕重呢？還是因為編者以為文匯報的讀者是知識分子、同青年們沒有什麼關係？抑還是編者以為突出這條消息，會影響“爭鳴”，因為“爭鳴”中似乎是不適合多說什麼黨的領導、社會主義的，我因為說了兩句，就很遭到有些人的反對。……

我不想判別是非，也許各有各的道理，“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吧，——因為不同的編報方法也是“爭鳴”之一種，毛主席就說過，報紙這樣辦、那樣辦就是兩家。我也不想去分析其中的

优劣，因为现在也还是各人顾各人的方法去干，例如对李維汉的談話，人民日报是突出了“社会主义是长期共存的政治基础”作为标题，并且用“……总的說来，从各方面提出的批評和意見，有很多是正确的，应该认真地加以接受和处理；有相当一部分是錯誤的，还須要进一步加以研究和分析”作为副标题，而文汇报则以“中共誠懇欢迎监督和帮助”为标题，以“认为很多批評和意見有助于克服三大主义进一步加强和巩固共产党的核心领导作用”为副标题，明眼人一見就可看出彼此着眼点是不同的。但我以为，这种不同是比“千篇一律”好得多的一种好現象。我更不想去追究各人着眼点不同的心理状态，因为我并无“未卜先知”之才。所以关于是非、优劣、原因，都待进一步加以考証。

有人要問：你自己就沒有見解了嗎？答曰：有的。但不想說。不想說的理由呢？答曰：也不想說。这并非如唐弢同志所說的“欲說还休”，而有另一种原因。然而这至少駁倒了一种理論：“新聞的編排是沒有政治性的”，編排也有政治的，“各取所需”即是。

我是很喜欢看文汇报的，因为它新鮮、有内容、报道面广。这回确很抱歉涉及了文汇报。好在文章中并无一个“主义”也沒有一頂帽子，也沒有“判決”是非，大概不会被人目为“棍子”。如果能引起讀报人及編报人一点点思索，我的愿望就达到了。末了，希望这篇涉及文汇报的短文能在文汇报的副刊上登出。（六月六日）

（1957年6月14日人民日报）

“新聞与出版”第十九期評論

嚴肅認真地学习

人民日报的兩篇文件

人民日报社論“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是中国人民

新聞事業歷史發展中一個極其重要文件。它和它的姊妹篇“文汇报在一個時間內的資產階級方向”，對於樹立新聞界正確思想，爭取進一步办好一張社會主義報紙有着無法估量的重大意義。

我們希望新聞界同志們認真地學習這兩篇文件，用它來檢查那些殘留在我們思想中的資產階級的新聞觀點，樹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辦報思想，同時還要用它作為武器來同新聞界中的右派分子進行尖銳的鬥爭。

應當承認，並不是所有的人都充分地領會這兩個文件的精神和實質的。我們千萬不要把它孤立地看成是對文汇报事件的評論。社論的確集中批判了文汇报的資產階級方向，但是它的實際意義卻遠遠超出文汇报問題的范围以外。

什麼是這兩篇社論向我們提出的重要問題呢？

第一，是報紙的基本方向問題。這就是說，我們可以有不同特色的報紙，但是，它們的基本方向——社會主義的方向必須一致。代表資產階級方向的報紙在我們國家是不能允許存在的，因為在我們社會主義國家，“報紙是社會主義經濟即在公有制基礎上的計劃經濟通過新聞手段的反映”。而在資本主義社會，“報紙是無政府狀態的和集團競爭的經濟通過新聞手段的反映”。報紙反映社會存在。我們的社會基礎已經再沒有代表資產階級方向報紙存在的可能，所謂“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便是這個意思。明確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它可以使我們對社會主義報紙和資本主義報紙作原則的區別，保持堅定的立場和清醒的頭腦。最近一個時期新聞界一度出現的思想混亂，便是由於混淆資本主義國家的報紙同社會主義國家報紙的原則區別所造成的。

我們學習這一點，就是要檢查和端正我們從事新聞工作的基本立場；要從思想上明確兩種性質不同的報紙代表兩種不同方向的原則區別；要站在黨的立場上努力使報紙具有鮮明的無產階級

的社会主义的立場和方向。这也正是日前新聞界人士在热烈討論中所提出的一个口号，“用一切努力办好一張社会主义的报纸”。

第二，根据上述的前提，应当肯定，在世界上存在着阶级区分的时期，报纸总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社論对这一点的肯定，澄清了近一时期許多流行的观念，譬如有人認為大規模阶级斗争已經結束，报纸作为阶级斗争工具的作用已經消失。有人認為要把商品性、趣味性、公共服务性強調起来，以之来冲淡我們报纸的阶级性；有人对报纸作为党委領導下的机关报作用发生怀疑，甚至提出“取消机关报”的說法；有人否認报纸有对羣众、对实际工作的指导作用等。这些同志只看到革命时期大規模的阶级斗争基本結束这一面，他們忘記了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結束，他們忘記了世界上存在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对立的社会主义体系，他們还忘記了报刊担负着严重的思想斗争和思想教育的历史責任。正是由于在这些基本方面发生了錯誤的或模糊的观点，所以不能不影响到办报的立場問題。右派分子則利用我們某些人在原則方面的动搖，乘机而入。

我們学习这一点，應該懂得，报纸不是这个阶级的斗争工具，便是那个阶级的斗争工具，“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沒有調和的余地。光明日报經過几次对资产阶级方向的严肃批判，正象人民日报“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社論所指出的：“立場根本轉过来了”。标志是什么呢？这就是由章伯鈞、儲安平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斗争工具，轉成了革命的社会主义的斗争工具，“由此恢复了讀者的信任，象一張社会主义的报纸了。”文汇报呢？他們扭扭捏捏，犹抱琵琶半遮面，在人民面前不得不做出自我批評的姿態，骨子里却是另外一回事。他們6月14日的自我批評不敢承認是资产阶级的斗争工具，反而說什么：“錯誤地理解了‘鳴’‘放’政策”。完全不对。人

民日報的社論說的對：“文匯報在春季里執行民盟中央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方針，向無產階級舉行了猖狂的進攻，和共產黨的方針背道而馳。其方針是整垮共產黨，造成天下大亂，以便取而代之，真是‘幫助整風’嗎？假的，真正是一場欺騙。”這樣，文匯報也就不能不是“替反動派做了幾個月向無產階級猖狂進攻的喉舌”，我們應當從文匯報事件中取得足夠的教訓，一切模糊以及削弱報紙階級性的說法都是騙人的鬼話，它只能幫助資產階級向黨和無產階級進攻，從而變成階級敵人的工具。

第三，要用階級分析的方法，正確估計新聞界的思想動向。我們要嚴肅認真地估計從2月以來在這個不平常的春天的日子裡，新聞界所經歷的“三個多月的发展，比平常狀態下的三年還快；三個多月給予人們的教訓，比平常狀態下的三年還豐富”這個大的變化，特別是要從北京召開的新聞座談會以及各地召開的新聞座談會中吸收頗為集中而又豐富的、反面的和正面的教育材料。人民日報社論通過對於新聞座談會的評價，意味深長地評述了新聞界的政治氣候：

“新聞記者協會開了兩次會，一次否定，一次否定之否定，時間不過一個多月，反映了中國時局變化之速。會是開得好的，第一次黑雲壓城城欲摧，擺出了反動的資產階級新聞路線。近日開的第二次會，空氣變了，右派仍然頑抗，多數人算是有了正確方向。”

短短數語，鮮明而生動地描繪了新聞界一個多月來的思想大變動。

黨向我們敲了警鐘。無可否認，前一期，右傾思想在新聞界中是相當弥漫的，當着中國天空上突然黑雲亂翻的時候，相當多的人無視敵人的進攻，不少人思想上繳了械，少數人隨着右派的調子唱將起來，右派分子則混水摸魚，利用時機興風作浪。此

情此景集中突出地出現在新聞記者協會第一次召開的新聞座談會上。在第一次會議上，我們听到了多少新聞界的右派言論：談取消黨對報紙的領導者有之；談改變報紙的階級性質者有之；談唱對台戲者有之；談報紙已非階級鬥爭工具而要以追隨社會需要作為辦報方針者有之；談取消報紙指導性而代之以商品性、趣味性者有之；談向党“爭取新聞自由”者有之……，怪談謬論，五花八門，亟盡放毒之能事。概括言之，不折不扣的反動的資產階級新聞路線是也。回憶當時會上，我們執行黨的政策未予立即還击，但當個別同志稍一提正面的意見予以反駁時，即受到四面八方的反對，“你們是要‘收’啊”，“我們不敢談了”，這不是完全表現“黑雲壓城城欲摧”這句話的情景嗎？當然，欠債是要還的。當我們把一些紀錄送給某些發表錯誤言論的人審閱時，有的人警覺起來，以為批判將至，于是在原稿上大加修改，這反映了時局加速變化的開始。不久，形勢逼人，很多要求退回發言稿。到了第二次會議，情況完全變化。大多數人要求檢討，一部分人隱避起來，希圖躲風過關，右派分子負隅頑抗。我們所以願意多費點筆墨概述一下兩次新聞座談會的前後變化，是因為它反映了新聞界同志們受到一次嚴格的階級鬥爭的考驗。大家從立場模糊、動搖轉向堅定、明確。這是新聞界在偉大、變動時期的一個重要的歷史轉折點。

也正因为如此，我們敢于希望新聞界同人以人民日報文件作為武器，乘胜追擊右派分子，聚歼殘留在人們頭腦中的資產階級觀點，為办好一張社會主義報紙來打一次漂亮的思想戰，更加堅定和巩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辦報思想。

解放日报六月十六日社論

办 报 要 有 立 場

(略,見“批判王中的反动新聞学理論”初編)

新聞日报六月十六日社論

坚决地同資產階級办报傾向作斗争

如果仔細翻一翻前一个时期的报纸,包括本报在内,在不少地方,都可以从字里行間看到資產階級报纸方向的阴影,不过濃淡的程度有所不同。文汇报和光明日报,則更突出一些。

有些編輯記者,对报纸上的大鳴大放,总感到不过癮,不痛快,总認為市委和中央束住了自己的手脚。新聞日报副总編輯陆詒同志在中共上海市委宣傳工作會議上,竟指責党中央对报纸的領導方針路綫是收,不是放。好象百家爭鳴,百花齐放的方針,不是中央提出的,倒是他自己的新發明。原来新聞界中也有若干人,对放、鳴的涵义,有他們自己“独特”的見解,他們不是要“放花”,而是要“放火”,不是要“百家爭鳴”,而是要一家独鳴。于是他們写文章发新聞,大声疾呼,要放到基层,而不管是否会影响生产。一遇到儲安平之流的“警辟”議論,就如获珍宝,于是打专电啦,加花边啦,标大字啦,放到重要地位发表,唯恐不能引起特別的注意。如果遇到对錯誤言論的反駁,則似乎打在他們身上一样,发表时尽量使人注意不到。誰要以突出地位报道了这种新聞,他們就起来責难。发表孙大雨誣控許多好人为反革命分子的新聞时,新聞日报标了一个“孙大雨如此談人民內部矛盾問題”

的标题，夠朴素，夠客現了，然而，竟象闖了禍一样，不仅民盟陈仁炳打电话来詢問这个标题是誰标的，要記賬，就是在新聞界队伍里面，竟然也引起了一些責难。陆詒同志还責怪这个新聞“太长”了。这就难怪他們埋怨中央不夠放手了。原来他們不是站在工人階級的立場上，为了团結，为了社会主义的利益而放、鳴，而是另有自己的打算。

这些同志，自封为反教条主义的先鋒，他們一听到思想性就搖頭。在他們看来，过去的報紙簡直是教条主义的化身，一无是处。陆詒同志在上海宣傳會議上的发言中，借他人之言說：“報紙上的文章，一片教条主义，真象画符念咒，根本談不到解决思想問題”。这样，将广大新聞工作者看成是“画符念咒”的魔師，一笔抹煞了广大新聞工作者的劳动，一笔勾銷了过去的成績。这不是修正主义又是什么呢？以修正主义来反对教条主义，会有什么好的結果呢？

他們有时也談党委要領導報紙，但實質上是不要党的思想領導。复旦大学新聞系主任王中同志認為党委有一种“旧习惯”，他說：“报社如果按照党委的旧习惯去办报，便会造成報紙脫离羣众”。他說的“旧习惯”是指什么呢？原来是“习惯于抗战时期和階級斗争时期的作法”。难道現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时，就沒有階級斗争嗎？这种“习惯”已陈旧得完全不适用了嗎？用階級斗争的观点来領導報紙就一定要脫离羣众嗎？这种偷偷摸摸否定党委領導的意图，在某些地方已有事实的表現，如某报在处理王造时在宣傳會議上的发言时，对党委負責人的正确意見，連一个小标题也沒有，反对党委的錯誤意見，却用大号字体标出惊心动魄的标题。“服从党委的領導”這句話，对这些同志來說，不过是騙人罢了。我們揭发这些資產階級办报的傾向，当然不否定近来報紙工作中有目共睹的成績，也不是否認大多数新聞工作者为社会主义